

新中国文化外交 70 年——传承与创新*

杨悦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但是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要求，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外部需求。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独特作用，国民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著增强，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外交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发展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内外合力、扩大交流”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四个历史阶段，旨在系统梳理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尝试回答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 文化外交；中国外交；中国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 杨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北京 邮编：100037）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20.01.005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20）01-0072-1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6ZZD029）的阶段性成果；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文化与外交：中国对外社会文化交往研究”（项目编号：3162015ZYLL07）的阶段性成果。

新中国成立至今，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不但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布局，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将文化外交实践称为对外文化交流，并将其视为外交工作的一翼。70年来，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战略传承体现在一直秉承“反对霸权、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相互吸收”的战略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又丰富了“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合作共赢”的原则。变化则是由建国初期的以政治与军事为中心的依附性战略转变为与对外政策中政治、经济并重的独立要素。从政策和实践层面看，也已从建国初期的政府领导、以革命宣传为导向、单向展示性文化输出转变为以政府统筹、社会参与、官民并举、市场运作为方针，以人际交流为抓手、以价值观传播为主要内容、以文化产业和新媒体技术为手段的多层次、内外联动的双向文化交流。下文将在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四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文化外交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文化先行、外交殿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在建国不久就成立了负责文化外交的专门机构。1949年11月，文化部设立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专门负责文化外交工作。1951年，该局改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1955年改名为对外文化联络局。1958年3月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改组为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然而在战争和革命的影响下，此时的文化外交呈现出一些独有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初期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面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阵营的尖锐对立，周边形势令人堪忧，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国内尚未完全解放。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鉴于此时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互利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结合、三个世界划分等重大外交思想。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故以“反对霸权、支持第三世界、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相互吸收”为指导思想。

建国初期的文化外交以政治与革命为中心，以宣传中国革命成果、支持世界革命为主要目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手段与形式较为单一，大多是文艺演出、杂技等单向对外文化宣传。对外交流以革命语言形式为主，较为机械和呆板。交流对象

仅限于双边，与国际多边组织的交流尚处空白。^①文化外交实施“一边倒”政策，把“以苏为师”作为优先方向。由于建交国家数量有限，民间文化交流作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重要手段，表现较为活跃。周总理曾指出，“中国的外交是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外交”，充分肯定了民间外交的作用。^②此时的亮点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等东欧国家是首批与中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的国家。

在冷战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文化外交意识形态色彩浓重，行为体由公立和官办机构组成。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也使文化产业在文化外交中缺位。^③这样不但加剧了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对立，使中国相对地封闭，丧失了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同时一味照搬苏联模式也不利于中国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外交曾一度停顿。1969 年春，根据周总理指示，相关部门组织了一个 20 人左右的工作班子，处理对外友协等几个民间团体紧急和重大的外事工作，至此民间交流才迅速得以恢复。^④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官方文化交流到 1976 年年末才得以恢复和发展。到该阶段末期，文化外交逐步去意识形态化。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变化，从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出发，要求中国不能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⑤总而言之，此一阶段的文化外交也发挥了促进与其他国家间联系和友谊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更是起到了“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积极作用。

二、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改革开放至入世前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已同 110 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⑥邓小平提出不以意识形态差别考虑国家关系的新思路，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国家关系应遵守的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90 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

① 《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年，第 28—238 页。

② 宋恩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 1 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1997 年，第 255 页。

③ 吴白乙：《文化外交：历史、现实的审视与思考》，《美国研究》2016 年第 3 期，第 20 页。

④ 《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年，第 225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30 页。

⑥ 王逸舟、谭秀英：《中国外交六十年（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8 页。

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重大举措。江泽民还将国际新秩序理论的内容从政治与经济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同时调整了不结盟战略，提出伙伴关系和“多边外交”的战略思想。

文化外交成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要求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具体到对外关系上，明确提出经济开放的同时，文化也要对外开放。^①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②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③文化外交进入以“全面开放、全面参与”为指导思想的历史新时期。

首先，恢复建立专门机构负责文化外交工作，加强政府统筹。自1968年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被撤销之后，文化外交工作一直未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1978年9月，国务院决定文化外交由文化部归口管理。1981年3月，恢复设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1982年5月，对外文委并入文化部，负责全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归口管理。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是履行文化外交的工作机构。

其次，文化外交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桎梏，交流对象遍布世界五大洲。这一时期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文化关系进一步加强，同欧美和大洋洲发达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文化关系日益发展，是建国以来文化外交蓬勃发展的全面繁荣时期。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④

再次，形成了多元主体、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多品类的文化外交新局面。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协会为例，文化交流项目到20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②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77页。

③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人民网，1997年9月12日，<http://www.people.com.cn/GB/34948/34968/2682712.html>。

④ 孙家正：《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对外大传播》2001年第8期，第44页。

纪末就达 1406 个，涉及五大洲 82 个国家和地区，比 1966 年前增长上百倍。^①

最后，开启多边文化外交的新时期。自 1982 年在北京举办了“亚洲地区保护与发展民间文化传统舞蹈讨论会”之后，在中国举行的多边艺术活动和参加的国际性、区域性文化艺术活动逐年增加。1978 年 8 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Amadou—Mahtar M’ Bow）与邓小平会面，彻底结束了双方零合作的局面。阿马杜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第一个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会谈备忘录》。从 1978 年下半年到 80 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 300 个。^②1979 年 2 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

三、内外合力、扩大交流：入世至十八大召开

入世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更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发展空间愈加广阔，提升自身文化水平与国家形象的客观要求也更加迫切。胡锦涛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和谐世界”两大外交战略思想，成为该时期文化外交发展的指导思想。两大战略思想既基于对世界大势和自身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也源自内敛、防御的中华文化基因。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以及自身发展对和平外部环境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两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文化外交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国内文化建设被提到战略高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成为文化外交发展的重要支撑。1998 年，中国参加了“文化政策为发展服务”的政府间国际会议，会议提出将文化纳入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政策决策过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文化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位一体的新要求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中心，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国家软实力本质上来自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并论述了如何构建核心价值观以及如

^① 葛慎平、范中汇、龚道全：《金桥新篇：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50 年纪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

^② 陈辛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略》，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年，第 584—585 页。

何使价值观念转化为人们自觉追求的问题。^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为文化外交赋予了核心内涵，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重要标志。

第二，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根支柱。^②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全面规划了文化外交的发展蓝图，确立其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地位，明确了其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十六大报告指出，“将继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③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④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⑤一系列政策阐述明确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文化外交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第三，部门统筹更加科学，助推文化外交高质高效发展。2009年11月，对外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建立，成员单位包括文化部、外交部、商务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加强统筹协调和形成合力，为开展文化外交投入了更丰富的资源。在这段时期，有50多项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举办。欢乐春节、亚洲艺术节、中非文化聚焦等一批重点文化交流活动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文化外交的标志性品牌。原文化部与商务部紧密合作，加强政策扶持、平台建设和出口模式提升，推动中国文化“旗舰”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舞台。随着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零距离与国外民众交流的平台明显增多。

最后，文化外交成为带动国内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国从多边交流中的学习者和受益者转变为资助者与分享者。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为例，中国在该时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到29项，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7项，使中国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

①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人民网，2007年10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② 孙家正：《提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求是》2006年第1期，第35—36页。

③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网，2002年11月18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Nov/233921.htm>。

④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人民网，2007年10月25日，<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101/6429414.html>。

⑤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2年第1期，第3—7页。

多样性得到更好的保护。^①2004 年，第 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中国苏州召开，带动国内各层面开始关注遗产保护，相关法规相继出台。在教育领域，中国开始贡献自己的力量。自 2005 年，中国开始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扫盲奖”，帮助农村地区扫盲教育和失学儿童；中国还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长城奖学金名额。^②

四、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十八大以来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文化同样受到全世界瞩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迫切希望了解和认知中国文化，同时“锐实力”“文明冲突论”等外部挑战也日益升温。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新时期，文化外交承载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十八大以来，两份党的最高政治性文件（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统筹了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政策，体现了中国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文化外交的完整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

第一，文化外交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文化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的总体目标，提出了“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③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④的实施原则。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要求和任务，并要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⑤作为公共外交的核心内容，

^① 卢茹彩：《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共进》，今日中国网，2015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chinatoday.com.cn/chinese/sz/zggc/201511/t20151124_800043213.html。

^② 卢茹彩：《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共进》，今日中国网，2015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chinatoday.com.cn/chinese/sz/zggc/201511/t20151124_800043213.html。

^③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④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⑤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2 年 11 月 8 日，http://www.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文化外交的价值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可。在2019年5月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四点主张，为文化外交注入了“合作共赢”的新元素。中国不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带动各国共同发展，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这是文化外交最具新时代特征的使命。

第二，文化体制与政府机构改革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助推文化外交发展。2013年，我国设立国家艺术基金，为管理、资助、扶持和引导国内文化建设以及推动优秀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新机制和新平台。^①2018年，原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整合成立文化和旅游部，下设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负责文化外交工作。这次改革不是两个部门职能的简单叠加，而是要使文化和旅游两者互为依托、共促中国文化走出去。

第三，元首外交与文化外交联动，中国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国际辐射力显著增强。习近平主席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还是中国文化外交的践行者。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外出访数十次，无论是署名文章还是主旨演讲，皆充满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元素。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习近平以“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强调“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②表达了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的深刻思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以“天下一家”表明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立场和态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天下一家”，传递出了中国始终奉行的“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③

第四，思想外交成为文化外交发展的新阶段，助力中国文化国际认知度的提升。“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和“汉学与当代中国”等品牌项目为中外汉学家构筑了思想交流的平台。2013至2018年，“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已举办六届，邀请了来自56个国家的150位汉学家参与，推动了中外高端思想文化交流。“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自2014年创办，至2018年已举办了12期，培养了来自95个国家的360位青年汉学家，为支持海外青年汉学家开展中国研究搭建了平台，与各国学术机构共同推进中国研究在全球的发展。

① 杨悦、肖羽婧：《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文化外交——以国家艺术基金“走出去”项目为例》，《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1期，第114页。

②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15年3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③ 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新华网，2017年12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2/31/c_1122192418.htm。

第五，文化外交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全方位提升中国文化领域开放水平，努力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也将“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单列一章。“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原文化部于 2016 年发布的《“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是落实《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具体举措。近年来，“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不断完善，周边文化外交成为亮点。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中包含了近十项文旅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成果。^①

第六，积极搭建多边交流平台，中国的引领作用凸显。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不但有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世界各国也十分期待中国倡议。2013 年 11 月，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7 届大会主席，是该组织史上首位中国主席。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任要职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影响力和领导力的充分认可。中国创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多个区域和全球多边平台，推动多边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提出的多边交流合作倡议稳步落实。2015 年 9 月，在北京启动了联合国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项目，通过科学、教育和文化传播来促进海陆丝绸之路区域城市公共部门、私营领域与地区性社会组织间的国际多边合作，增进彼此了解与尊重。

第七，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能力增强，加深了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大力推进中华文化外译，解决中华文化经典海外“失语症”问题。2015 年，原文化部和北京语言大学共建了中国文化译研网，帮助全球多语言读者及时发现、翻译、创作和分享优秀中国文化作品。截至 2017 年 8 月，中国已与 50 多个国家签订了相互翻译对方经典作品的协定。原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在 2015 至 2018 年间联合举办了两届“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建立了中外影视译制领域的国际化专业交流与合作的新机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以 22 个语种、25 个版本在海内外发行 625 万册，中国理念、中国制度、中国方案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内得以传播。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②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高度认可。

第八，运用新媒体科技手段，大力打造外宣旗舰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明显增强。

^①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新华网，2019 年 4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8/c_1124425293.htm。

^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再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人民日报》2017 年 11 月 3 日，第 21 版。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①2017年3月,中国环球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目前,中央电视台已形成全球化的采编和传播网络,海外整频道用户达4亿户,分布在168个国家和地区。人民日报社实现了主要英文社交媒体平台全覆盖,脸书公共账号粉丝量达3000万,推特粉丝260万。近五年新华社稿件在世界主要通讯社互引统计中位列榜首。^②

最后,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和竞争力显著增加。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出台后,对外文化贸易迈上新台阶。文化产品进出口连续多年保持顺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取得积极进展,形成了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走出去”新格局。2018年,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37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总额达163亿美元,为历年最高水平。富含中华文化元素的工艺品、美术产品、艺术收藏品和各类出版物的出口规模和增幅位居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前列。^③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文化外交的发展

新中国文化外交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在国际上,中国文化的认可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4至2017年间,全球对中国明显喜爱的国家数量略有下降,从52%降至48%。^④数据的客观科学性虽有待商榷,但也能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文化外交仍然存在问题和挑战。择其要者: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在较大程度上限于京剧、武术等脸谱化的文化符号层面,走眼走耳不走心的局面尚存;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和价值观的了解和认同有限;三是将文化“走出去”等同于赢得软实力的误区尚存,^⑤在如何“走出去”、拿什么“走出去”方面亟待提升;四是大而不强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文化内容产品与体验服务产品

① 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01版。

② 卫庶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1日,第11版。

③ 袁晴、王灿:《数字速览“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成果》,光明网,2019年4月29日, http://politics.gmw.cn/2019-04/23/content_32767790.htm。

④ Richard Wike, “Global Attitudes toward China and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21, 2017,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7/09/21/global-attitudes-toward-china-and-the-u-s/>。

⑤ 张志洲:《文化外交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动因、问题与对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第12页。

水平还远落后于文化制造业的水平，而前者又在价值观影响力方面远大于后者；五是如何应对当前“文明冲突论”重新升温的外部挑战以及当今世界第一次需要一个东方文明的国家引领发展议程的外部机遇。这些都是涉及中国自身文化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并获取认可的能力的提升、以及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等新时代文化外交亟需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新时代文化外交的发展应在坚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中华文明为文化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改革开放成果为实践基础之上，统筹好国内文化建设和国际文化传播的关系，以两个创新为推手，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课题做出创造性回答。

（一）国家文化能力建设创新

成功的文化外交依赖于国家自身的文化水平，反之国家的文化建设也得益于成功的文化外交。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要求。意识形态决定了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在文化建设创新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同时应做好以下几件事情：1. 要紧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灵魂主线，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对物质和文化生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2. 要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会贯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 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4. 对世界文化资源的批判和借鉴。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实践创造中实现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促进文化进步，推动中国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

（二）文化外交的多维度创新

新时代文化外交须在理论、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创新。首先，构建新时代文化外交的文化理论支撑体系和核心文化话语体系。近十几年来，中国提出了不少文化外交理念，从建设“和谐世界”到更加务实的“新型大国关系”，然而这些理念亟需文化理论体系系统地阐述其背后的文化基因。秦亚青建议“要以人类视野深入挖掘和凝练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要挖掘中华文化中真正具有人类共同价值和意义的思想”。^①文化理论体系和核心文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也要在挖掘中华文化同当今时代的共

^① 秦亚青：《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世界知识》2019年第1期，第57页。

鸣点上发力。^①只有讲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和世界意义,才能真正助推中国更好地与外界开展深层次的文明对话。第二,了解海外受众需求,做好分众化和精细化传播。^②对海外受众的文化需求和偏好做持续性的“大数据”调研和收集,在传播中减少“文化折扣”现象,提升传播效果。第三,新时代文化外交不应止于文化交流,应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重视发挥人的作用,用心沟通。第四,新时代文化外交要沉下去、融进去,善用城市、社区与民间力量。目前,文化外交实践更多的是在国家政府及精英间进行。然而要促进民心相通,则需构建城际与社区文化交流体系,夯实国家间关系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第五,提升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质量,在内容创造上精益求精。目前,世界已经不满足于对中国文化的浅层次了解。因此一方面要打造能够彰显兼具中华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精品力作,一方面也要将国外民众对中国文化产品接受的现状纳入文化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全过程。^③第六,打造更多的思想对话平台,结合新媒体技术,增加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要覆盖青年群体,解决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第七,区分对象、精准施策。对战略分歧较大、政经矛盾较多的国家,注重在社会与民间层面发力,疏解矛盾;对重视对外关系中文化因素的国家,要在文化领域做好精准对接,将其打造为双边合作的新增长点;对仰慕中国文化的国家,要加大中华文化正能量的传播,增强中华文化的塑造力。第八,搭建跨领域、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学术共同体,在国内外共同提升新时代文化外交理念和实践创新的造血功能。在国内,加强国际关系、文化、语言、文学研究领域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谋划。在国外,除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挥作用以外,同时要推动驻在国的学术机构、文化机构、社会民间团体对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进行研究和传播,借力传播,事半功倍。最后,中国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指导原则,以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新的文明观为价值导向,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构建和谐共生的人类文化共同体。

【收稿日期:2019-10-19】

【责任编辑:张志洲】

① 张志洲:《文化外交如何赢得软实力》,《对外传播》2012年第10期,第37页。

② 张志洲:《还是让中国外交话语保持合理的“难懂”吧》,澎湃新闻,2015年5月27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4910。

③ David Clarke, “Theoris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Products in Cultural Diplomacy from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September 2014, Vol.22, No.2, p.147.

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Third, Thailand, a middle power in the GMS,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coordina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ough the main thrust of Japan's approach to China in the GMS is still competition, their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in Thailand has provided a new way for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in the GMS.

【Key Words】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Sino-Japanese all-out competition,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the 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of Thailand

72 **Seventy Years of Chinese Cultural Diplomacy: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By Yang Yue

【Abstract】 To fulfill the important task of China's cultural going out in the new era, cultural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Since its founding 70 years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sistentl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ural diplomacy, which has always played a foundational and pilot role. With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diplomacy strategy and its related policy planning in place, Chinese cultural diplomacy has made much progress, enhancing the country'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Based 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and the practice of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how China should approach its cultural going ou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ultural diplomacy, Chinese diplomacy, Chinese culture, Xi Jinping thought on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84 **Competition of National Influ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ix Southeast Asian States: An Audience-based Transnational Comparison**

by Bao Zhipeng & Jin Canrong

【Abstract】 When assessing a nation's influenc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not only to its magnitude, but also to how it is perceived by publics. Based on findings from six Southeast Asian states, China has already surpassed the US in terms of overall national influence. Specifically, the traditionalism-leaning audience hol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China whereas the pro-authoritarianism audience hold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US.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clearly affect the public's appraisal of the influence of both China and the US. Although China enjoys an edge in terms of overall influence,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globalization in this region is still limited. It'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ts influence as it seeks to shape reg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China should continue its efforts to increase its edge in globalization and fashion its own brand with global influence.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enhance China's image on social media and encourage more civil organizations to go global.

【Key Words】 national influence, Southeast Asia, China, the United States